

【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孙子兵法》哲学智慧及其现代价值研究专题

## “伐谋”以“成事”：《孙子兵法》之实践智慧及其价值启迪

陈二林, 王雯雯

(合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09)

**摘要:**《孙子兵法》从战略谋划、战术运用、管理指挥、君将修为诸方面, 阐明和强调了智谋韬略对于士卒生死、民众祸福、战争胜负、国家存亡、社稷兴衰与天下治乱的决定性意义, 大大弘扬了崇“智”尚“谋”以“成事”的人文传统。这一实践智慧渗透和贯穿于历史经验的汲取、道义立场的坚守、战争进程的掌控、现实功效的发挥与理想目标的追求之中, 具有系统辩证性、务实理智性、包容和合性、权变创新性、通鉴普适性的精神向度。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多有契合融通之处, 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行稳致远乃至诸多全球问题的解决, 都展现出积极而重要的价值启迪。

**关键词:**《孙子兵法》; 实践智慧; 价值启迪; 精神向度; 人文传统

**中图分类号:** E 89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86/j.issn.2097-4973.2025.05.002

从历史上看, 一场惨烈的世界战争、一轮严重的经济危机、一次巨大的自然灾害、一场肆虐的传染疾病, 就有可能使人类元气大伤, 甚至是濒临绝境! 如此复杂严峻的情形警示人们, 面对时有发生的风险挑战, 要具备超前进行规划、科学制定方略、理性采取行动、审慎处理危机、友善对待自然的实践智慧! 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 可谓“最讲智慧”“而且是最聪明最机灵的哲学”<sup>[1]</sup>, 其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行稳致远乃至诸多全球问题的解决均具有积极而重要的价值启迪。

《孙子兵法》自诞生以来, 人们就对其展开了持续不断的探研, 新见高论迭出代有, 多番掀起“孙子学”热潮。近年来, 学界更是对其进行了多维度、深层次的解析研讨, 特别是围绕其所蕴涵和体现的思想精髓、文化精神、思维方式、心性之

学、生存艺术、斗争哲学、功利理性、行动策略、战略智慧、政治智慧等方面, 展开了深入的探究剖判, 并由此挖掘阐发其丰赡的价值与意义。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哲思义理起源于对人生世事的忧患体察有着紧密关联。的确, 在那个充满动荡变乱的春秋战国时代, 以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农家及名家与阴阳家为主要代表的诸子百家, 均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人文关怀, 并纷纷提出各自的思想主张与救治方案。作为兵家的孙子, 更是无暇、无意也无兴趣去建构一种抽象而玄虚的形而上学, 而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与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 非常清醒、明确、高效而实在地提炼出一套既吸收众家之长又独具特色、既有理论深度又可操作应用的战略战术与制胜之道, 以积极应对和妥善处理治国用兵这样关乎生死存亡的“国之大事”(《孙子

收稿日期: 2025-06-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4AKS017); 安徽省质量工程重点项目(2023jyxm1373)

第一作者简介: 陈二林(1972—), 男, 安徽望江人, 副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先秦思想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E-mail: 1397419000@qq.com

兵法·计篇》)。为此,立足于“两个大局”,结合当今时势发展,继续深入抉发、系统梳理和有效化用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传统兵学所内蕴和展现的实践智慧,就显得非常必要与亟须。

### 一、崇“智”尚“谋”以“成事”的人文传统

中国历史上的先秦时期,从“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到“周人尊礼”(《礼记·表記》),尤其是殷周之际经由剧烈而深刻的政治社会变革与思想文化激荡,人本身开始极大地觉醒与开悟,逐渐实现从“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之“神本”观念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之“人本”观念的转换,有别于宗教蒙昧而主张“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与崇“智”尚“谋”以“成事”的人文理性日益形成。这在周文王与周武王任用姜太公、周公、召公等一批贤臣谋士,推行和实施文韬武略以完成“小邦周”而“克”掉“大邑商”的宏图伟业中,已然得到确证。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强调“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彖传》),则可谓周代贤明人士以象数与卦爻辞这种符号与文字相映照与匹配的样式,对人生世事的流转演变加以深入解析、理性推测和积极应对的历史见证。这一阴阳互补、“三才”互动的素朴的理论模型,也较为充分地体现了推天道以明人事、尽人事以听天命的实践智慧,与夏商以来重天命鬼神而轻人为人事的思想观念不可同日而语。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文理性的特征更为凸显。以“修己以安人”与“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也即成己成人、开物成务为社会理想的儒家,推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论语·述而》),这般宽猛相济的为政智慧,以及“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反身而诚”(《孟子·尽心上》)的内外兼修的修养智慧。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一方面推崇“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三十七章》)的超然大智与“以正治国,以奇用兵”(《道德经·五十七章》)的治理智慧,表现出“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弱胜强”的“后发制人”的思维倾向<sup>[2]</sup>;另一方面则对那种“智慧出,有大伪”(《道德经·十八章》)的强为矫饰之智与“有机械

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庄子·天地篇》)的投机取巧之智,持明显的摈斥态度。法家韩非子更是从纵向比较的角度,探寻了古今社会发展流变的深层动因,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虽然这种一一对应关系的论述未必十分确当,但其把道德、智谋、气力三种人为因素作为影响与推动社会嬗变的三大要件,还是颇有见地的。而以“兼爱”、“非攻”为思想旗帜的墨家,虽承认“天志”、“明鬼”的存在而具有些许宗教色彩,但其同时大力主张“尚贤”使能以兴利除害,也反映了对人文理性的重视。即使是看似远离现实生活而提出“合同异”与“别同异”的名家,也并非停留于纯粹的形上思辨或逻辑推理,而是同时属意于人伦政治的建构。诚如论者所言,“公孙龙主张一种清晰性和确定性的名称分类方式,并以此希冀一种等级分明的政治秩序;惠施则强调名称分类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并以此主张一种万物平等和‘泛爱’‘一体’的政治世界”<sup>[3]</sup>。

可见,中国先秦以来的传统文化所推重的人文理性与实践智慧,不仅指单个人所具有的才学技能与德行修养,更主要反映和体现了民族整体对于自然宇宙、人生社会、治国理政等重大事情与根本问题所持有的“价值取向、知识经验、行动方式、存在规定”<sup>[4]</sup>。不同于“以物观之”、“以心观之”、“以言观之”的思想倾向,对于注重“以事观之”进而探讨人的存在与价值之关联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言<sup>[5]</sup>,人文理性的强弱、治理方略的优劣与制胜之道的高下,不仅关乎个体的安身立命与自由发展,关乎自然宇宙的生成运转,更关乎民族国家与江山社稷的生死存亡与治乱兴衰。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崇“智”而尚“谋”以“成事”的实践智慧的至为重要的个中缘由。

### 二、《孙子兵法》实践智慧的内涵要义

高扬三代以来崇“智”尚“谋”以“成事”的人文传统,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先秦兵家,提倡“先知”、“先计”、“先谋”、“多算”、“因形”、“任势”“备战”、“制胜”,推崇“巧能成事”的实践智慧。在孙子心目中,“战争”是一件事关全局、牵涉广泛、影响深远的“大事”,是一项需要统筹谋划、通盘考虑、审慎进行的“要事”,尤其要重点关注作

为统兵作战经济基础的“操事”，以及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成败得失的“间事”。<sup>①</sup>因而，“其强调在战争全过程中要始终将战争的基点与重点，置放于作为主体的活生生的人而非神秘外在的天命鬼神，强调人谋而反对天命鬼谋，尤其是强调人之理性精神、创新精神、功利意识、忧患意识在‘安国全军’中的重要意义”<sup>[6]</sup>。也正是立足于兵凶战危的客观现实与积极能动的主体作用及其交互影响，故此，其大力倡导以高超的智谋韬略“胜于易胜”，而反对仅凭单一的线性思维与直接的实力比拼去赢得战争，从正面视角与特定领域阐明和强调了智谋韬略对于士卒生死、民众祸福、战争胜负、国家存亡、社稷兴衰与天下治乱的决定性意义，讲究和追求以智谋制胜的兵家由此而被视为智慧的化身。

《孙子兵法》重“智”而尚“谋”以求“全胜”、“全利”而“成大功”，始终高举人文理性的大旗，频繁求“知”、论“计”、推“算”、明“识”，而极力反对“不知”、“无算”、“无虑”，其兵法十三篇远出于“众人之所知”而充满卓绝超群的实践智慧。诚如吴如嵩先生所说：“‘智’是孙子思想的核心，他以知情（知彼知己）为基石，这是真；以善战为追求，这是善；以全胜为灵魂，这是美。这三者构成真善美三个不同的境界。”<sup>[7]</sup>孙子所追求的这种真善美合一的高妙境界，实际上也就是一种鲜活灵动、至高至深的智慧境界，其渗透和贯穿于历史经验的汲取、道义立场的坚守、战争进程的掌控、现实功效的发挥与理想目标的追求之中。

具体而言，孙子的实践智慧表现为多层次、多维度与多义项。首先，孙子的实践智慧是一种战略谋划智慧。其“认为斗智胜于斗力与斗勇，要求战争指导者在信息全面与情报准确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既深谋远虑又通权达变以制胜的本领，把谋略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原则”<sup>[8]</sup>。相较而言，正如吴如嵩先生所论，“《孙子兵法》作为一部智慧之书，在军事学术上所表现出的智慧反映在多个方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战略智慧，特别是其大战略智慧，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孙子认为，通过不战而胜、胜于无

形，利用矛盾、坐收渔利，预知胜负、谋深虑远，胜于易胜、应形无穷，就可以实现全胜战略。”<sup>[9]</sup>这种大战略智慧也是一种哲学层面的普适性智慧。《孙子兵法》所阐扬的通过“上兵伐谋”以实现“不战”而“全胜”的战略谋划智慧最为引人注目也最为启人神思。

其次，孙子的实践智慧是一种战术运用智慧。在世界兵学史上，《孙子兵法》创造性地提出了颇具特色的“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制敌方略与“因敌而制胜”的应变策略。这些制敌方略与应变策略主要表现在攻敌无备、因粮于敌、因敌制胜、料敌制胜、夺敌所爱、威加于敌、顺详敌意、并敌一向、践墨随敌、应形无穷等方面，体现了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同舟而济的创新思维。<sup>[10]</sup>这种制敌方略与应变策略的形成和实施，以对敌我双方乃至天下诸侯复杂多变情势的理性认知、整全观照与灵活因应为先决条件。故而，其特别强调“先知”、“尽知”、“必知”，尤其要深入了解和研判对手具体特点与整体情形，进而重视对由综合因素而造成的战机与“战道”的精准把握与深刻洞悉。总之，孙子的战术运用智慧，集中表现为积极主动的制敌方略与灵活机动的应变策略，表现为依据实际“形”“势”而充分发挥人之主观能动性的一系列创新思维。

再次，孙子的实践智慧是一种管理指挥智慧。其强调“治众如治寡”，即要通过“曲制”、“官道”、“主用”、“形名”、“分数”等规章制度，从精神、士气、心理与情感等方面对部属进行积极引导、有效管控与灵活指挥，尤其要形成遵循权力逻辑与理性逻辑、来源于并服务于整体利益的“领导权威”<sup>[11]</sup>，以产生“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神奇效果，达到“上下同欲者胜”之切实目的。而对那种“怒而不服”、“怗而自战”与“独进”、“独退”者，即主要由于将帅官吏管理不善与指挥无方而造成的部下游离于纪律规则之外的偏私情绪与任性行为，则给予严厉谴责与坚决抵制。因为这会严重干扰和破坏军队整体的作战意图与统一的行动计划，导致无法实现“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之良好效能，妨碍“全

<sup>①</sup> 《孙子兵法》中“事”字凡17见，出现频率较高，主要有“国之大事”、“三军之事”、“为兵之事”、“将军之事”、“以决战事”、“犯之以事”、“易其事”、“以诛其事”、“不得操事者”、“不可象于事”、“事莫密于间”、“五间之事”、“死间为诳事”等说法。

胜”、“全利”与“安国全军”之战略目标的达成。

最后,孙子的实践智慧是一种君将修为智慧。在孙子看来,作为君主将帅须具备较为全面过硬的综合素养,要努力成为“有道”之“明君”、“明主”与“智、信、仁、勇、严”五德兼备之“贤将”、“良将”、“智将”与“知兵之将”。这就要求君主具有“将能而君不御”之宽宏气度,将帅拥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之坦荡胸襟。惟其如此,才能做到“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秉持“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与“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之理性法则。即是说,君主将帅要尽力杜绝感情用事与草率行事,善于“治心”而防止被人“夺心”。君主只有坚守信任、协作、仁义等原则底线,才能避免“乱军引胜”之悲剧,才可“使间”、“用间”;将帅只有保持“静以幽,正以治”,即冷静沉稳、端庄持重、赏罚严明之理智心态与行事风格,才不至于“覆军杀将”,也才能真正堪当“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的重大责任。

战争是敌我双方乃至多方综合力量的高强竞争与集体智慧的激烈角逐。故而,孙子强调要以理性态度对待战争、以明智理念指导治军、以高明方法指挥作战,在战略谋划、战术运用、管理指挥、君将修为等方面显发高妙卓越的实践智慧。恰如黄朴民教授所论,“崇智尚谋,是《孙子兵法》乃至整个古代兵学的基本特色”<sup>[12]129</sup>。

### 三、《孙子兵法》实践智慧的精神向度

与西方传统文化起源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而展现出一种“求知本性”(亚里士多德语),侧重于抽象的形上玄思与烦琐的语义分析,而主要表征为“如何说”的纯粹理性与理论智慧有所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起源于对人生世事的忧患而展现出一种“入世本性”,侧重于具体的人伦日用与规范的言行举止,而主要表征为“如何做”的实用理性与实践智慧。

孙子之实践智慧呈现出系统辩证性、务实理智性、包容和合性、权变创新性、通鉴普适性的精神向度,体现出政治与军事、战略与战术、道义与功利、局部与整体、目的与手段、动机与效果、科学与艺术、现实与理想的有机融合。

一是系统辩证性。基于丰富实践经验与深

入理论考量,孙子提出敌我、主客、形势、攻守、全破、众寡、强弱、治乱、勇怯、虚实、奇正、巧拙、迂直、速久、利害、安危、死生、胜负、存亡等一系列事关全局的辩证互动的矛盾概念与环环相扣的连锁关系,强调“五事”与“七计”即涵括天时、地利、人和、武备与谋略,也即包含内因、外因、硬实力、软实力、客观实在性与主观能动性五大方面的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动态互补、密不可分成事要素<sup>[13]</sup>,以道论政、以德论人、以利论兵、以变论战、以全论胜,构建起疑天而取人、审时而度势、因敌而尚变、重德而保民、不战而全胜的严整的思想体系。其总是跳出战争看待战争、超越战争谋划战争、不把战争作为唯一手段,擅长以宏阔视野审视战争、致力于从全局把握战争、从关联互动的角度擘画战争。无论是在对待战争的理智态度上,还是在军事与政治、经济、外交、天时、地利、人情等整体关系的妥善处理上,抑或在战略制定、战术运用、管理指挥及君将修为的统筹安排上,都显示了发达的系统辩证思维。

二是务实理智性。出于对战争残酷危险与成本代价高昂的冷静洞察,《孙子兵法》全书自始至终贯穿了“理性指导原则”,“体现了一种可贵的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sup>[14]357</sup>。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不仅开创了系统的功利主义思想,而且也是先秦现实理性精神的主要源头”<sup>[15]</sup>。其要求“一切以现实利害为依据,反对用任何情感上的喜怒爱憎和任何观念上的鬼神天意,来代替或影响理智的判断和谋划”,强调在对“现实经验和具体情况的观察、了解、分析中,要迅速地从纷繁复杂的错综现象中发现和抓住与战争有关的本质或关键”,进而机智灵活地开展行动。其紧紧立足于社会现实与发展趋势而提出的涉及谋划战争、制定战略、判断战局、选择战机、采取战术、管理指挥的一系列法则方案,具有“把握整体而具体实用,能动活动而冷静理智的根本特征”,这种“冷静的理智态度更是与儒家实用理性一道,构成了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sup>[16]71-96</sup>。

三是包容和合性。为适应“胜敌而益强”的社会现实,兵家孙武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杂采融合了儒、墨、道、法、阴阳家等诸子百家之长。其要求君主将帅推行政道,具备德能,义利双修,德法结合,严爱相济,文武并施,教民治军,使得君民

“同意”、“上下同欲”，进而实现“安国全军”、“不战”而“全胜”之理想目标。在孙子看来，“对时势的正确把握、对仁道的大力倡导、对事功的合理确定、对谋略的精巧擘画、对实力的科学运用，需要把天、地、人‘三才’有机结合起来，把君主的贤明、将帅的睿智、民众的支持有机结合起来”<sup>[17]</sup>。这充分“体现了‘崇道’、‘尚义’、‘勇武’的兵学思想，具有丰厚的人文意蕴和道德情怀”<sup>[18]</sup>，展示出强烈的包容和合精神。

四是权变创新性。孙子基于对战争领域的深入观察和切身体验，顺应从“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司马法·天子之义》）到“兵以诈立”而“以利动”之时代潮流，以“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变易观为认识前提，主张“因敌而制胜”、“因敌变化而取胜”、“践墨随敌”、“战胜不复”，倡导“因利而制权”、“因形”而“任势”、“诡”“诈”用兵，为此而可“君命有所不受”，反对拘守成命、墨守成规而不知变通，表现出强烈的权变创新精神。由于战争形势瞬息万变、“战争迷雾”扑朔迷离，这就要求军事指挥员既要具备科学家的严谨不苟，也要具有艺术家的灵动飘逸，从而臻于一种“不可测”、“不可先传”、“无形”、“无声”、“无法”、“无政”的“神乎”“微乎”的玄妙境界，此即艺术境界。<sup>[19]</sup>也恰是这一“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的创新艺术化境，使其迥然区别于西方克劳塞维茨所推崇的“绝对暴力”的战争理论。有论者可谓一语中的：“与克劳塞维茨相比，孙子的战略主张表现出一种古典的优雅风度。在他那里，战争的主要内容是智谋，是理智的谋划与准备，是多种战略原则的艺术性运用。……在颇大程度上，孙子兵法很难让人感觉到战争的暴力本性和其中的血腥、激情、仇恨和恐惧。”<sup>[20]</sup>

五是通鉴普适性。《孙子兵法》阐明的战略战术，蕴含着“道”、“法”、“术”、“器”即政道兵理-法则技艺-方法途径-综合实力的系统辩证、互动相济的实践智慧，远超军事斗争领域，在政治外交、商业竞争、管理运筹、科教文卫、体育竞技、人际交往等诸多领域，得到高度重视与广泛应用，具有通鉴普适性。这些实践智慧“具有普遍的意义，不仅限于对敌斗争，也适用于我们在各个领域的人生体验。我们如能将其兵法与其事迹，特别是他治军作战的指挥艺术结合起来加以研究，

无须东联西挂，无须牵强附会，孙子的智慧就能与我们的的心灵沟通，就能使我们心领神会，从而使我们得到启迪，得到享受，得到愉悦”<sup>[7]</sup>。

一言以蔽之，孙子的实践智慧表现出系统辩证性、务实理智性、包容和合性、权变创新性、通鉴普适性的精神向度。孙子“文略而意丰”的思想理论早已超越时空而融入整个历史进程，成为全人类所共享的不竭的智慧源泉。

#### 四、《孙子兵法》实践智慧的价值启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sup>[21]</sup><sup>35</sup>《孙子兵法》经国治军、谈兵论战、教民用众、“因形”而“任势”、“修道而保法”、“伐谋”以“成事”的制胜之道与实践智慧，“展示出从神到人、化知为智、转智为能的思维理路”<sup>[6]</sup>，在思维方式、理论架构、行动方案、价值追求、境界追求等方面，展现出系统辩证性、务实理智性、包容和合性、权变创新性、通鉴普适性的精神向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多有契合融通之处，具有积极而重要的价值启迪。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程中，我们党之所以能带领人民一次又一次闯关夺隘、攻坚克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能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系统辩证地看待处理一系列重大矛盾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尤为注意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强调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加以“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辩证分析和主动把握机遇与挑战，不断完善顶层设计与优化战略部署，而不为一时一事所惑，不为任何风险挑战所惧，保持战略定力和坚定信念，以钉钉子精神一张蓝图抓到底，朝着锚定目标踔厉奋进。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与首创精神，广

泛汇聚民智民力,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正因为有了这种务实理智精神,我们才能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不断开辟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顺应时代潮流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之路,奋勇开拓出一条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我们秉持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的中国式现代化,与那种通过殖民扩张、战争掠夺等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方式以实现现代化的西式老路有着质的区别,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呈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着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与胸怀天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客观实际情况,不懈探索与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革命与建设道路,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突破与重大成就,充分体现了权变创新精神。这种精神在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与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冲破思想禁锢而开启改革开放之路、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而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及驳斥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历史终结论等谬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之路,虽具有鲜

明的中国特色,亦具有普遍意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把自身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有机关联起来,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倡导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正确义利观、全球治理观,在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和全球性问题中,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思想智慧和当代中国的责任担当,展现了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与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宽阔胸襟。如今,我们更是通过恢宏实践与辉煌成就向世界证明,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探索和走出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sup>[22]16</sup>。

综上所述,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在对历史经验与社会现实全面深入地总结扬弃与洞察体悟的基础上,提炼出关于治国治军、“伐谋”以“成事”的丰富而深刻的实践智慧,富有特色和创见地体现与彰显了夏商周三代以来,尤其是殷周之际由于社会政治变动与思想文化激荡而孕育催生的忧患意识、务实精神、功利理性、仁道追求、淑世情怀、创新气魄、整体思维与开阔视野。如此丰盈深邃、求全重利、贵谋向善的制胜之道与实践智慧是穿越时空而不可多得的瑰宝财富,尤其值得当今的人们认真探奥、反复体味、礼敬传扬、有效汲取和灵活运用。这对于我们在动荡不安、变乱交织的全球化时代,看清形势、把握方位、站稳脚跟、完善方略与正确行动,大力推进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宏伟事业与远大目标的如期实现,有着重要助益和深长启迪。

#### 参考文献:

- [1]李零.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 [2]黄朴民.《老子》兵学思想简论[J].孙子兵法研究,2023(2):43-53.
- [3]姚裕瑞.何种秩序:“合同异”还是“别同异”[J].哲学动态,2024(8):56-66.
- [4]杨国荣.论实践智慧[J].中国社会科学,2012(4):4-22.
- [5]杨国荣,刘梁剑,等.人与世界:以事观之——杨国荣教授访谈[J].现代哲学,2020(3):111-117.
- [6]陈二林.《孙子兵法》军事哲学思想及其当代镜鉴举要[J].孙子兵法研究,2022(2):22-31.
- [7]吴如嵩.智慧孙子[J].孙子研究,2015(6):88-95.
- [8]陈二林,孙玉红,董功攀.《孙子兵法》的思想精粹、理论贡献及其当代价值[J].滨州学院学报,2013(5):16-21.

- [9]吴如嵩.《孙子兵法》的战略智慧[J].滨州学院学报,2013(5):1-5.
- [10]阎盛国.制胜法宝:《孙子兵法》的制敌方略与智慧[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82-88.
- [11]廖吉喆.《孙子兵法》中的领导权威研究[J].孙子兵法研究,2023(4):36-44.
- [12]黄朴民.孙子兵法十八讲[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
- [13]陈二林,黄熙.《孙子兵法》的成事体系及其现代启迪[J].滨州学院学报,2015(1):11-17.
- [14]付朝.《孙子兵法》结构研究[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0.
- [15]赵志超.先秦兵家对政治的影响[J].南都学坛,2011(1):43-47.
- [1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 [17]陈二林.《孙子兵法》之“道”“术”“器”思想方法探赜[J].滨州学院学报,2022(1):25-35.
- [18]侯昂好,李元鹏.《孙子兵法》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N].光明日报,2023-11-22(7).
- [19]姚振文.《孙子》思想的三重境界[J].船山学刊,2009(4):132-134.
- [20]翟东升,时殷弘.对孙子的克劳塞维茨式批判[J].战略与管理,2003(5):30-35.
- [2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22]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Disrupting the enemy’s plan through strategy” to “achieve success”: the practical wisdom and value enlightenment of *The Art of War*

CHEN Erlin, WANG Wenwen

(School of Marxism,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China)

**Abstract:** *The Art of War*, born 2500 years ago and hailed as the “classic of military science”, expounds and emphasizes the decisive significance of wisdom and strategy for the life and death of soldiers,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the outcome of wars, the survival of the stat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ation, and the order and chaos of the world from the aspects of strategic planning, tactical application, management and command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monarch and the generals, and greatly promotes the humanistic tradition of valuing wisdom and strategy to achieve success. This practical wisdom with rich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penetrates and runs through the absorption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the adherence to moral positions, the control of the war process, the display of practical effects and the pursuit of ideal goals, which has the spiritual dimensions of systematic dialectics, practical rationality, inclusiveness and harmony, flexibility and innovation and universal applicability. It has many points of convergence and integration with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which demonstrates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value enlightenment for the steady progr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s well as the resolution of many global issues.

**Keywords:** *The Art of War*; practical wisdom; value enlightenment; spiritual dimension; humanistic tradition

(责任编辑:许 金)

**引用格式** 陈二林,王雯雯.“伐谋”以“成事”:《孙子兵法》之实践智慧及其价值启迪[J].山东航空学院学报,2025,42(5):12-18.

CHEN E L, WANG W W. “Disrupting the enemy’s plan through strategy” to “achieve success”: the practical wisdom and value enlightenment of *The Art of War*[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2025, 42(5):12-18.